第七章

诺伯特·埃利亚斯

李　康

“文明国家的大批民众辗转受苦，但并不比蒙昧的民众更能获得需求的满足；而蒙昧的民众即使受无数桎梏的约束，却有着自由与兴奋作为补偿。”单看头半句，你或许会以为，这又是一位批判理论学者针对所谓现代工业文明对人心的压制而发出的“箴言”，但后半句却又使我们不再囿于这一猜测，牵动内心微妙的新奇感，遥想那粗朴而不失浪漫的悠远往世。说这话的人几乎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进步、灾难与再生，而波澜起伏的20世纪也见证了这位世纪老人不随时势而动的一生。他，就是诺伯特·埃利亚斯（N. Elias, 1897—1990），一位生于德国、逝于荷兰、在英国生活了30年的犹太人，一位70岁以后才被世人挖掘出来，在十数年前的社会学理论教科书中绝不会提到的“大师”。

第一节　动荡年代的坚定一生

埃利亚斯一生的经历与其学术的关系极为密切。不了解他那起伏跌宕的经历，就很难理解他独特的学术品格。他一生基本上游离于学术主流之外，纵横在各门专业之间，拒绝臣服于任何貌似无所偏倚的预设而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尽管长久默默无闻，他仍始终坚信人们将会承认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增进整个人类的认识[1]。身为犹太人，且参加过一战的亲身体验，母亲死于奥斯威辛的惨痛回忆，使埃利亚斯毕生抱定信念：社会学的任务或自己工作的意义，在于防止战争重演，开启民智，寻求社会运行过程中最根本的机制，以解决各种

INSTITUTE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无谓的知识争吵和意识形态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一、"哲学"的贫困

1897 年 6 月,埃利亚斯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父母皆为犹太人。但他少年时期并未受到这一身份的过多困扰[2]。中学毕业后,埃利亚斯被征入伍参加了一战。回国后在布雷斯劳大学习读医学并兼修哲学。但不久他便放弃了已达相当程度的医学,专攻哲学。这段经历使他对人的生命及自然科学有了感性的切实体会,思想中盘旋着诸如社会的复杂关联——"组织"(tissue)、脸部的符号传递这样的思路。但他并没有将精神活动还原为生物学,而是从生物学角度更深刻地挖掘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最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哲学老师赫尼格斯瓦尔德(R. Hönigswald)所持新康德主义立场的缺陷。大学期间,埃利亚斯曾去海德堡大学和弗赖堡大学短期学习。听过李凯尔特的课,并和雅斯贝斯多有来往。不过,他对当时流行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的学说都抱有怀疑的态度。

在因经济原因短暂休学之后,埃利亚斯于 1924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观念与个人:关于历史哲学的一项探析》,触及了整个康德哲学传统的核心。康德认为,在人类思维里,诸如牛顿式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以及一些根本性的道德准则,都是人的思维中先天固有而非得自经验的,是普遍永恒的范畴。这成了埃利亚斯一生致力研究批判的目标。他想要在论文中探讨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思考人类相互依赖的横向安排,以及形成仿佛是"自成一体存在"的秩序形式的长期社会过程,并将所谓的先验范畴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知识链中加以考察。但他发现哲学传统内缺少分析工具,只能诉诸社会学的方法。

二、从海德堡到法兰克福

1925 年,这位没有任何学术庇护关系的"老学生"来到了海德堡。虽然他时年已近三十,并持有哲学与心理学的博士文凭,但还是打算开始一门新的学科——社会学。此时他才逐渐开始熟悉社会学经典著作,但在他看来,社会学家知识背景的杂多正是一种优势,第一代社会学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0 年代的海德堡大学无愧为社会学的中心。一方是以韦伯和齐美尔为代表(时皆已过世)的自由资产阶级(还包括舍勒、桑巴特、滕尼斯等);另一方则为逐渐兴起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双方汇聚于海德堡。韦伯去世后,其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时任海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其遗孀玛丽安妮影响甚大。而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年轻一代中最出色、名气最响的则要算曼海姆。依照惯例，埃利亚斯找了阿尔弗雷德·韦伯做类似于导师的提荐人，其授课资格论文选题是佛罗伦萨社会及文化在由前科学向科学的思维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专此游访了意大利。与此同时，他还与曼海姆过往甚密，成为他非正式的助教与助手[3]，并通过曼海姆进入了韦伯遗孀所主持的沙龙。他在沙龙中宣读的第一篇论文，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哥特式建筑风格，探讨了中世纪法国与德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在教堂建筑风格上的反映。

埃利亚斯与其导师之间在学术上依然合不上拍。阿尔弗雷德·韦伯关注的是"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过程，认为文化发展不同于经济、科学与技术，后者是呈现出（线性或辩证）进步态势的，而文化、宗教与艺术则无所谓进步与倒退，我们应该将文化视为人类灵魂的自我实现。这在埃利亚斯看来，无非是重复了德国思想传统中"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这一观念对立。他不认为这两者是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对立要素，而是关注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构建出来，成为两个彼此竞争的群体及其生活方式的标志的。

但埃利亚斯和曼海姆思想间的分歧影响或许更为深远。他反对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观点，认为"缺少意识的存在与缺少存在的意识，这种二元对立的命题是一种虚构"。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相对于其他各个社会群体，与经济力量的关联不是那么直接，故此更有可能比较准确地认识社会现实。但埃利亚斯认为曼海姆的分析才刚刚起步。他在日后对"投入"与"超脱"的分析中，不再限于从哲学、方法论或个人乃至阶级的动机角度来谈社会科学或整个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而是将这一问题置于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之中。

1929 年曼海姆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就此邀请埃利亚斯作正式的带薪助手。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手下无甚前程的埃利亚斯自然乐于应从。该校社会学系租的是著名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楼。而整个大学尤其是社会学系则更是充斥着当时德国大学罕见的自由空气。他与阿多诺等人频繁在咖啡馆中展开讨论，同时仍兢兢业业地充当着曼海姆的助教。他尽心尽责地鼓励每一个学生从各自不同的生活（职业）背景出发，以社会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熟悉的世界。一位当时的学生日后如此回忆道："他极其招人喜欢……体察每一个人各自的问题……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瘦高个儿，爱好运动，几乎天天游泳（现在还是如此），又是个出名的滑雪爱好者……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友善的微笑……说话总是从容不迫，诚挚谦恭，但也会开怀大笑。"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三、流亡岁月

1933 年 2 月希特勒上台。犹太血统的埃利亚斯匆忙通过各种程序,晋升编外讲师[4]。这位沉着的人赶在纳粹到来之前销毁了留在社会研究所里的重要文件,在去瑞士谋职未果之后,开始流亡巴黎:要重新当学生,他可太老了;而要是担任教授,他可又太年轻。

埃利亚斯在巴黎住了近两年,并迅速介入了咖啡馆中的文化生活,结识了包括纪德和马尔罗在内的著名人物,其间发表了《庸俗年代的庸俗风格》及非常敏感的《胡格诺教徒逐离法国》,这是这位 38 岁、潜含巨大潜力的社会学家首次公开发表学术文章。但他在经济上十分困顿,在与人合作小生意失败后,这位不懂英语的法国文化崇拜者被迫去往英国。好在英国有个犹太流亡救济委员会愿意为他提供生活资助,而这位学者的唯一谋生之道是写书。他自称当时尚无主意,但拿了人家的钱总得有所交待,于是在大英博物馆浏览群书,"偶然"对礼仪手册产生了兴趣。这一"偶然"一发不可收拾,演变出来两大卷著作。

1939 年,《文明的进程》[5]历尽磨难之后终于出版。这部著作取例精微,立意恢弘:它追溯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礼仪习俗与人格的"文明化",以及这种过程与国家形成、国家内部权力的垄断化之间的关系,并期望借此发展一种"过程性"的社会学模式,彻底拒弃传统社会学中的许多根本假设。

但这部书的出名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大战将临的欧洲,又有谁会发思古之幽情,去读一个德国犹太人写的两大卷关于"文明""礼貌"的书?它当时出版后迅速埋没在了故纸堆中。而埃利亚斯继续在英国苦熬:父亲去世,母亲死于奥斯威辛,自己也曾被关进敌侨营。战争刚结束时,他曾被英国情报部门短期雇用,协助甄别战俘中的纳粹分子。但旋即他又陷入了四处"打工"的窘境。他在各大学客串讲座,供职成人高教,同时还作为唯一一位社会学家,参与创建了群体分析协会(group analytic society)。战后初期他自己也寻求了心理治疗,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有许多东西却写不出来,经常感到被逼迫出成果的焦虑[6]。

四、花甲逢春

1954 年,57 岁的埃利亚斯被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同为犹太移民)聘用,开始步入正规学术生涯。他在为一年级学生开的概论课中,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自己"过程"视角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后来以《什么是社会学?》为题出版。但他无论在哪个范围里来说,都不属于主流。过程性的历史视角在帕森斯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和功能主义当道的时代，只能是一种分支或“背景”[7]。埃利亚斯与学生斯科特森合作研究了莱斯特郊区一社区的权力关系与心理反映，其成果后来以《局内人与局外人：对社区问题的一项社会学考察》为题出版，渗透了他对德国—犹太关系认同的儿时体验、法国胡格诺教徒处境等的反思。他还与邓宁（E. Dunning）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体育运动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后来也编撰成集，题为《寻求刺激：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运动与闲暇消遣》[8]。

1962 年埃利亚斯退休，继续去加纳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这位“高贵”的欧洲老人在阳光灿烂的遥远国度里，依旧满怀热情地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民间艺术品。他与毕加索一样，都被非洲民间艺术中那股较之 19 世纪欧洲艺术传统更直接、更激越的情感流露所迷恋。非洲生活使他亲身体验到“文明化”之前（之外）的生活方式（如目睹屠牲祭天）。

1969 年对于埃利亚斯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文明的进程》德文版初版 30 年后在德国重版。它迅速成为渴望摆脱美国实证化社会学在战后一统天下的局面的德国、荷兰年轻一代社会学者的圣经，一时洛阳纸贵。许多年轻学者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实践他的方法、验证他的结论。而他本人，这位昔日的落魄穷酸，也开始屡屡登上德国、荷兰等许多大学的讲坛。阿多诺在 1969 年去世前，敦请德国政府核准授予埃利亚斯法兰克福大学荣誉教授称号。1977 年他获得首届阿多诺奖[9]，1986 年更是获总统联邦贡献大十字勋章，这是联邦德国公民所能获取的最高荣誉。

晚年的埃利亚斯主要居住在比勒菲尔德和阿姆斯特丹。这位终生未婚的学者每一天都在充实的工作之中度过。他一般是早上十点左右游泳，然后清点、修改前日的工作。午后两点左右助手来到他的寓所，开始记录他的口述，一直到深夜十一点（除简短晚餐），然后是葡萄酒或威士忌相伴的一小时轻松交谈。这几乎是典型的充满思想活力的学者生活。就在这样的生活中，耄耋之年的他终于挥发自如地写出了自己的思想。直到临终的一刻，他还正在向助手口授一部有关弗洛伊德的著作。从 80 年代下半期起，在一群忠实景仰者的积极参与推动下，一系列著作相继编撰而成：《个人的社会》、《德国人：十九、二十世纪的权力斗争与惯习发展》、《符号理论》、《莫扎特：一位天才人物的社会学考察》、《论时间》……

1990 年 8 月，埃利亚斯卒于阿姆斯特丹，享年 94 岁。为他作学术传记的人将其一生概括为“动荡年代的坚定一生”。而他自己在后来结集出版的长篇访谈和自述中又这样回顾：“德国，英国，荷兰……我是一个旅人，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我们应该自己塑造有意义的生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第二节　文明化的过程

我们首先来看《文明的进程》这本书。此书主要的思路,便是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追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标准与心理特征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国家形成与内部安定过程的彼此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院派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派)纯粹用自然科学式的问卷调查或测试来研究人的态度与心理倾向,将原本是漫长历史过程的发展结果还原为一成不变的生物学模式。这显然是埃利亚斯所反对的做法。

至于说埃利亚斯所说的这些关联,也是有许多人认可的;但同样有许多人认为,埃利亚斯事先设定了人类(至少是欧洲社会中世纪以来)的社会行为与心理性格具有长期一贯的趋势或方向,或者起码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人就此指责他的作品体现出维多利亚时代进化论的乐观情绪,甚至是殖民主义的余波。而埃利亚斯认为,这种"趋势"或"方向"并不是理论预设,而是大量经验考据后的结论,况且自己也并不否认存在形形色色的反复与波动。此外,《文明化过程》的两卷是一个整体,思想的精髓恰恰体现在这种连接之上。

一、"文化"与"文明"

所谓"文明","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名文明人,就是要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公正有序、组织有素、可以预期、可以计算的社会之中"[10]。自称"文明"不仅是某种自我肯定,也是间接的对某些他人的否定,两者相辅相成。由于所谓"文明"或"不文明"的用语里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故埃利亚斯首先做的便是语源发生学的工作。

在"文明"的发展以及"文明"与"不文明"之间的相对距离达到一定程度后,词语的使用就会不知不觉走上一条自我固化的道路。从而,形成的过程被掩盖,状态成了本性。这是"文明人"(欧洲、上层、男人……)刻意保持局内人优势的结果和条件。集体经验通过关键词语逐步固化、积淀,成为下代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实在"。"文明"的西欧人只将自身作为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甚至"目标",而"不文明"的非西方"局外人"则成了对立面。

《文明的进程》开篇即比较了德国的"Kultur"与法国(包括英国)的"Civilization"两个名词。前者指的是个体性精神产品,可以不断生成与再生,无终极目标下的"进步"可言。德国知识分子以此自显国民身份(与他者的界限);而后者则指外在表现出来的物质、行为方式等,是一种通过过程逐步接近的目的,

是当时已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优势的法国中产阶级所持“大同”观的体现。也就是说，德法差异可用两国宫廷向中产阶级开放的程度和国家身份认同观来解释。德国知识分子力图把“Civilization”降为第二层次[11]；“Kultur”是知识分子使自身独立于“上层”（宫廷社会）和“下层”（劳众）的途径，前者的特点是深刻、浸淫群书、真诚、淳朴、个性发展；后者的特点是浮华、仪式性、虚饰以礼。德国资产阶级上升后，主要对手由本国的王朝贵族变成法国，所以，这貌似突兀或不着边际的首章既有其深刻的政治含义，也使我们联想到他与导师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知识分歧。

二、见微知著的“礼仪习俗”研究

埃利亚斯研究习俗礼仪，依据的主要是13世纪至19世纪欧洲的“行为手册”（manner books）或称“行为指南”。之所以应该更准确地称其为“行为”或“习俗”，而非径直称为“礼仪”（etiquette），是因为它们所论述和规定的，只不过是普通大众在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方式。埃利亚斯集中引证的也是最基本、最为人所忽视的人体活动，以突出其生物性和问题的普遍性。他正是想通过分析这种最不登大雅之堂的细枝末节，揭示人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结构不仅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有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不是随机的。

在埃利亚斯参引的诸多手册的著者中，不乏像伊拉斯谟这样的名人，但他认为这只是借个人之手反映出某种集体传统。许多手册几经再版，内容也多有修订。但在他眼里，更富研究价值的是被删去与被添加的内容，前者能够反映什么是已被普遍接受从而无须再强调的，而后者则折射出文明逐步“强化”的过程。

我们来看看他都分析了哪些方面的习俗礼仪：

餐桌礼仪：鼻涕擤在何处？何时出现桌布、刀叉、餐巾？共食还是分食？给别人夹食用什么？不爱吃的或吃剩的东西吐在哪儿？喝汤出声吗？……

生理活动：大小便、睡觉、洗漱、沐浴时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有固定乃至独立的场所或时间吗？是否同时与人交谈？被人撞见时甚至与别人谈及此事时有没有羞耻感或窘迫感？……

擤鼻涕与吐痰：是否应该背转身去？有没有用手帕（还是直接抹在手上）？有没有专用的手帕？痰盂的出现与消失是如何发生的？……

性：男女是否分床、分房？同性之间（包括朋友或是陌生人）呢？裸睡还是着衣？有没有睡衣？向儿童谈论性问题吗？……

若限于材料的挖掘与整理，那么埃利亚斯无非只是一个略带几分猎奇色彩的书虫，充其量不过比别人多几分心机。人们早已注意到行为方式上的这些变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化,也提出了许多原因。但埃利亚斯的高妙之处在于透过这些琐屑的问题,将我们的思路引到了人的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引到了人的情感与心理,引到了整个社会的运行过程,并一一驳斥了习惯上的解释。他认为,恰恰是这些解释,本身便属于变化过程,并构成了引起这些变化的机制,从而应该成为我们的分析对象。

首先,早期行为方式的粗朴并不完全是出于物质的匮乏,而后来逐渐变得精细也并非是物质极大丰富后的结果。需要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能反过来刺激生产或发明。贫困始终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各个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之所以各有不同,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在物质占有方面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在对物质的控制程度及要求方面的差异,并进而发展成自我认同、维护与他人的区隔的需求方面的差异。

其次,人们并不完全是因为认识到了健康的需要,才改变了早期"不合卫生"的行为方式;恰恰相反,常常是先有了行为规范,再产生出从健康与卫生的角度出发,对这种新的行为规范所作出的解释。也就是说,合法性的解释变成了必要性的说明。憋屁和咽痰早先是被人们视作有害健康的,但行为规范发展至今,已无需说明为什么在公共场合不能随意放屁和吐痰。手淫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先是宗教戒律,后来是医学的道理,都告诫人们不要手淫。但从"手淫有害健康"到"对手淫的担忧会发展成有害健康的焦虑",我们显然可以捕捉到健康、道德、社会等方面原因的相互交织。

埃利亚斯揭示到:我们诉诸卫生方面的原因,其实大多起着与道德方面的原因一般的作用,即用某种确定的社会标准来约束人们。原本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却逐渐成为自发的行为方式;原本是型塑而成的某种自我控制,个人意识之中却认为,这是他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有利于自身健康或人的尊严。纯"理性化"的原因或解释并非"文明化过程"的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正好相反,即"文明化过程"使人们愈益用理性化的方式思考或解释问题。

也有许多人认为,行为方式的逐渐"礼貌"是出于对他人(尤其是贵人)的尊重。的确,在世俗性的行为手册里,宗教性的原因较少出现,而更多的是以尊敬贵人来告诫读者。埃利亚斯认为,这里突出地反映了地位不平等。例如:在贵人面前裸身或宽衣是不礼貌的,甚至是一种罪恶,而贵人在下人面前如此行事,则是仁慈示亲的表现。他认为,19 世纪以后,由于各社会阶层愈益"平等",联系逐渐紧密,所以即便是贵人也会因此感到羞愧。显然,人们通常认为的这一点原因也是后来才逐渐变得不言自明的。

还有人认为,文明的进程也是情感逐渐由粗野暴力转向细腻平和的过程,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是情感的“温柔化”造成了行为方式的转变。固然，在中世纪，人们情感的满足充满了攻击性，社会行为中充斥着暴力与残酷。这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及与其有关的领域，在运动、执刑、对待女巫、对待动物（如大规模屠猫）的态度上都暴露无遗。但埃利亚斯认为，转变的关键不是从野蛮残忍到文明，相反，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文明化的结果。转变的关键在于情感逐渐趋于稳定，暴力式的激情愈益寻求非直接的宣泄方式，或者在诸如狂欢、（法国）大革命、战争、（纳粹）集中营这样的非常情境下寻求直接表露。埃利亚斯分析了许多极其细微的例子：执刑方式——从直接参与屠杀到观看公开行刑再到退隐于监狱之类的现代制度中；体育运动——由直接捕猎、搏击到间接竞技、游戏再到专业化、规则化的现代体育运动；肉类进食——从直接撕食活食到亲自加工再到（厨房的出现与现代大规模屠宰场的专业化操作所推动实现的）加工过程从餐桌边的退隐，如此等等。

总之，以往曾经给人们带来无尽愉悦的东西现在不仅仅是被禁止了，而且反倒成了不快的源泉。其原因在于：为社会所不欢迎的本能与愉悦的表现受到某些限制措施的威胁和惩罚，这些措施会使人们对原有的满足快感的方式产生不愉快和焦虑的感觉并不断巩固。攻击性情感与行为方式的逐渐驯化是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中世纪社会就是缺乏在整个社会实施这种措施的核心力量，如国家[12]。

因此我们就必须回答：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行为、心理产生了影响，那么社会结构本身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这样就过渡到了第二卷的分析。曼内尔认为，单就具体行为和心理特征的角度而言，以下三个方面在《文明的进程》中未得到充分的探讨，而对它们的研究显然会大有收获：

首先是死亡，为此埃利亚斯后来还专门撰写了《濒死的孤独》一书，来和阿里埃在这方面的经典研究争鸣[13]。约略地说，他认为阿里埃的观点不太全面。从中世纪到现代，对死亡的态度、感受之所以转变，是随着死亡从日常生活中的不断退隐、死亡过程伴随着衰老过程的分离与延长也不断延长而发生的。其次是睡眠。在中世纪，人们的睡眠在时间、地点及私密性方面都是很随意的。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工作与休闲、家庭在场所、时间上开始产生严格的分区，睡眠在时间、空间及私密性等方面也产生了严格的区分。更有甚者，睡眠被纳入“经济”，如市中心与郊区的区别、医院与旅馆的统计指标、安眠药（对不能按社会规定的时间入睡感到焦虑）。最后是胃口。这又涉及从宗教性到世俗性的食量控制，上层社会对饮食品位的追求以及配套礼仪的精致化，现代工业社会对胖的贬低（stigmatization），以及厌食症之类与饮食有关的身心疾病的社会生成等等。

埃利亚斯眼里的文明的进程绝不只是从中世纪开始的，可以说文明的进程

并无可以明确划出的起点。之所以选择中世纪作为分析的起点,只不过是因为在这一漫长时期内,行为方式的变化非常缓慢(但绝非毫无变化)。中世纪行为方式的总体特征是简单、粗朴,各社会阶层之间分化程度甚微,受情感驱使的直接性较高。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化,随着新型人际关系的出现,某种变化缓慢地发生了:检查自身行为的心理强迫作用愈益增强。行为标准也随之开始发生转变"。礼仪手册中开始出现许多针对别人考虑的事项:"为了避免他人……应该……"。也就是说,规范从直接的、命令式的、否定的转到间接的、细致的、肯定式诱导的(这与心理化的过程有关),从具体情境性的、在他人在场情况下的"应该"转为"慎独"。人们逐渐忘却了从外部约束到自我约束的转变过程,将"可能性"当做自来就如此的固定性。许多事项从行为手册中隐去,一是不再需要;二是也有更多的东西退入私密乃至成为禁忌[14]。

从外在的行为方式到内在的心理结构;从理性的自觉意识到情感生活的内涵与结构;从禁止(外在约束)到自我控制,这就是埃利亚斯见微知著的习俗研究展示给我们的意趣,但还远不止如此。

三、社会关系演变的动力

埃利亚斯在分析个人的行动方式与心理特征时,始终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背景的,准确地说,他分析的就是个人愈益紧密而全面地融入这种网络的过程、动力与后果。行为方式的演变与社会分层、社会权力机会分配结构的关系始终是《文明的进程》和《宫廷社会》的思考主脉。

最简单地说,自中世纪以来,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机会增多,彼此的关联也日趋紧密。渴望重塑新的集体认同的人十分注意与他人的交往,相互认同的程度不断增高,须注意的行为方式也趋于精细。在日趋富于竞争的社会里,上层(有意或无意地)鼓励下层模仿自身的行为方式,但同时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与竞争优势,又不断地提高自身行为的精致程度。这就在整个社会之中构成了一个循环递进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某个塑型在各社会单元之间传递的过程,埃利亚斯称之为标准化或塑型化(moulding)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孩童的个体发展重复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文明化发展,"文明"社会中成年人个体性格的"心理生成"与整个社会"文明"的"社会生成"有密切关系。但埃利亚斯也再三强调,这绝非说个体发育重复了系统发育。

埃利亚斯首先提出了两个封建时代的划分。在"第一封建时代",是"离心"作用和"封建化"过程居于主导地位。11 世纪左右则进入"第二封建时代",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1922

（最早在法国地区）出现“向心”作用和“国家形成”过程。第二卷的正面关注点就是这第二时期的国家形成过程。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欧洲封建化以来的历史过程能够代表文明化过程，那只是更加漫长的整个人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纵览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向心的作用，各种单元、网络不断扩大，关系不断增强，我们在以下章节中将做详细分析。

有关国家的定义，韦伯的说法可谓经典：国家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组织，它通过垄断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成功地宣称对特定的地域（即领土）拥有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权利。而埃利亚斯则具体说明了这种垄断是如何创立、如何延伸扩展的，并且说明这是一种双重垄断：对暴力手段和征税机制的垄断。

我们首先来看离心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控制力极弱的局面。因为自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人口锐减，市场荒芜，商品供求双方链条缩短，货币使用的范围下降，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小社区之中。由于经济主要是以易货贸易为主导，提供不出足够的赋税来维持较为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常备军，而这又是维持较大范围地域的统治所必需的。从某一个时期开始，人口逐渐明显表现出增长态势[15]。在人口的增长、土地的限制达到一定的转折点之后，向心力量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我们姑且不论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结论如何，埃利亚斯在此考察的关键在于：是怎样的社会过程带动起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整合和相互依赖的形式，使得市场不断扩大，供求双方的链条加长，对货币经济的需求又重新高涨起来。社会的单子细胞式结构开始逐渐瓦解。相互依赖的网络愈益密集。

产生和推动向心阶段发展的机制很多，除了为我们所熟知的市镇的勃兴与所谓“市民阶层”的形成、货币经济的上升之外，埃利亚斯主要分析了以下三种主要机制：

1. 垄断机制

垄断机制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暴力手段和征税手段不断集中到各个地域内的单个统治者及机构手中（这两种集中互为条件，或者说实际上是同一种垄断的两个方面）；二是通过与相邻统治者的竞争和相互剪除，扩大自己的地域。埃利亚斯将国家形成过程比作市场上各个厂商的竞争。就后者而言，除非是达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否则必定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国家形成过程中各国之间的竞争情形也是如此。参与竞争的数目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则是内部的稳定过程（internal pacification）：就长期趋势而言，在特定地域内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冲突，其直接诉诸暴力的倾向逐渐消减，并且冲突各方都就对他方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展开竞争。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最早在法国地区）出现“向心”作用和“国家形成”过程。第二卷的正面关注点就是这第二时期的国家形成过程。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欧洲封建化以来的历史过程能够代表文明化过程，那只是更加漫长的整个人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纵览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向心的作用，各种单元、网络不断扩大，关系不断增强，我们在以下章节中将做详细分析。

有关国家的定义，韦伯的说法可谓经典：国家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组织，它通过垄断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成功地宣称对特定的地域（即领土）拥有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权利。而埃利亚斯则具体说明了这种垄断是如何创立、如何延伸扩展的，并且说明这是一种双重垄断：对暴力手段和征税机制的垄断。

我们首先来看离心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控制力极弱的局面。因为自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人口锐减，市场荒芜，商品供求双方链条缩短，货币使用的范围下降，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小社区之中。由于经济主要是以易货贸易为主导，提供不出足够的赋税来维持较为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常备军，而这又是维持较大范围地域的统治所必需的。从某一个时期开始，人口逐渐明显表现出增长态势[15]。在人口的增长、土地的限制达到一定的转折点之后，向心力量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我们姑且不论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结论如何，埃利亚斯在此考察的关键在于：是怎样的社会过程带动起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整合和相互依赖的形式，使得市场不断扩大，供求双方的链条加长，对货币经济的需求又重新高涨起来。社会的单子细胞式结构开始逐渐瓦解。相互依赖的网络愈益密集。

产生和推动向心阶段发展的机制很多，除了为我们所熟知的市镇的勃兴与所谓“市民阶层”的形成、货币经济的上升之外，埃利亚斯主要分析了以下三种主要机制：

1. 垄断机制

垄断机制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暴力手段和征税手段不断集中到各个地域内的单个统治者及机构手中（这两种集中互为条件，或者说实际上是同一种垄断的两个方面）；二是通过与相邻统治者的竞争和相互剪除，扩大自己的地域。埃利亚斯将国家形成过程比作市场上各个厂商的竞争。就后者而言，除非是达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否则必定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国家形成过程中各国之间的竞争情形也是如此。参与竞争的数目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则是内部的稳定过程（internal pacification）：就长期趋势而言，在特定地域内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冲突，其直接诉诸暴力的倾向逐渐消减，并且冲突各方都就对他方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展开竞争。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作为其“载体”的群体与个人)逐渐在日渐复杂的网络中获得均衡地位,但与此同时,相对独立的社会功能也日益被不那么独立的社会功能所代替。如此一来,情感的型塑、动力与意识的结构,总之是整个社会人格的结构和态度都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通过《文明的进程》第二卷的分析,线索就又回到了第一卷及《宫廷社会》。

文明的进程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宫廷化(courtization)就是很重要的一种。这一过程中交织着从武士到廷臣的变化、世俗权威机构与教会机构的竞争。而埃利亚斯的主题则是:为什么一种特定的“奢侈”生活方式对于廷臣们来说是如此地必要。

具体而言,大约在17世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宫廷社会”,其成员的言谈举止与其他社会群体有明显差别。在《宫廷社会》中,埃利亚斯详细揭示了这种社会形态如何充当了维持并控制贵族的一种手段,如何型塑了贵族的人格,以及它在文化方面的后果。

他的分析首先从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的方面开始:旧制度时期,法国贵族及上层资产阶级有着形形色色的等级区分,其居所的内部结构与外表装饰都遵从着严格的等级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后来的居室安排相比较,此时居所的“公”、“私”区分是模糊的。贵族的社会日常生活不仅仅是消遣娱乐,不仅仅是休息,而是他们的职业生活本身,他们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表现出自己的等级,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和需求,因为这事关名誉,将决定自己升降的命运。是等级决定了应有的开销,而不是“量入为出”(更糟糕的是,贵族还不能随便做生意,因为那有失身份)。因此,不能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纯经济理性来衡量这些貌似非理性的挥霍行为。推动宫廷社会里这种“炫耀性消费”(凡勃伦语)的,是一种独特的“宫廷理性”,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性,但也都需要理性的预见和计算。从而都需要用短期的自我控制来换取长期的满足。

埃利亚斯从居所的安排进而更详细地分析了宫廷生活的细节:礼节、典仪、品味、服饰、习俗乃至谈吐的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都是争夺(和维持)地位与权力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贵族绝非“有闲阶级”,他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言行都负载着深厚的意涵。在宫廷社会,相互依赖成了一种必要,人们在日益细密的关系网中看着他人和自己,时刻保持反思性的观察,保持高度的自我控制,保持稳定的情绪,含而不露。甚至连国王本人也深陷这张网之中。这是一种声望的拜物教。埃利亚斯进而将分析的视角引向整个文化:沙龙的文化,古典艺术,巴洛克,洛可可,高乃依和拉辛的古典戏剧。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已对这种高度的自我控制有所意识,但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永恒的“人性”,大写的“理性”。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典型代表即是笛卡儿笔下单个自在思维着的成年头脑(这种哲学传统是埃利亚斯毕生致力批判的目标)。

埃利亚斯之所以选择法国宫廷社会为个案,是因为它对整个欧洲的宫廷(乃至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还分析了英国的议会化和德国的科层化。在这些过程中,普遍体现出心理化和理性化的趋势。心理化同时也是与他人的相互认同增强的过程:个体如何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的外在行为在别人那里的解释,观察自我与他人如何日渐变得重要,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在愈益复杂细密的关系网络之中进行的"游戏"或"博弈"(game)。而理性化在反对单一经济理性论调的埃利亚斯这里获得了新的意涵,体现为感性冲动的短期反应日益让位于长期预见性的计算。埃利亚斯认为,理性化的过程绝不是任何单一一个群体、阶级或阶层的推动结果,而是某一个社会领域中不同的功能群体彼此之间的张力,或同一个单位中的不同个人之间的竞争的结果。但这种竞争也是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压力的结果——保持身份。贵族感受到"下层"资产阶级的压力,不断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精致化"。但社会沟通的加快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其又不断地沦于"粗俗",从而又被推动产生新的精英式行为规矩。当然,这种过程不仅仅是所谓的"渗下效应",而是愈益平等的"功能民主化",导向多重相互依赖,多极控制。

五、社会生成与心理生成

纵观全书,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进程下最基本、最普遍的结构过程是劳动(或者更广义上的社会功能)分工的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社会网络的复杂性上升,人际之间相互依赖的链条加长,对个人的压力加强,从而需要更多的控制与预见,从自发的、即刻的冲动到长期稳定的自我控制。埃利亚斯形象地指出:行动的网络变得如此复杂和深广,要想在网络中举止"得当"需要付出如此艰巨的努力,其结果是在个人有意识的自我控制之外,牢固地树立起一种自发运作的自控机制。它就像一堵根深蒂固的恐惧之墙,防止个人越出社会规范,作出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来。

这种融合社会生成与心理生成的视角是埃利亚斯一生的思考途径。以"技术化与文明化"一文为例[16]。埃利亚斯通过比较中世纪与现代(汽车)社会中,人们行路时所面临的危险、为此所作的心理准备和行为反映的质的不同,十分生动地体现了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之间,人的互赖关系网与个人的自控机制的不同。在古代(欧洲),政域分割,路途险恶,需要的是情感上和身体上同时具备即刻作出反应的能力,不稳定的情绪——随时准备战斗,对于维持个人的生命来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说其实成了一项优势因素；而在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冷静的自持、计算和遵守规则（以及对他人遵守规则的期待）。

埃利亚斯进一步推广了自己的分析：在中世纪，各个城堡彼此分隔，经济自足。人与人之间的关联链短，相互依赖程度低，情感易变、外在、易走极端；在国家的内部稳定（对一定地域内的协调）后，对暴力手段取得了垄断，人与人的可计算性增强，而随着关联链的紧密化，计算和预见的需要也增强，情感也就发生了变化。动物性的个人生理（需求或防御性）行为和直接触及身体的暴力都逐渐从日常生活的场景中隐退。

总之，埃利亚斯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一方面是国家对暴力更有效的垄断所形成的更均衡的社会控制机制；一方面则是个人人格中形成的更均衡的自我控制机制。如果说，中世纪随时预备拔刀相向的行路人就像随时准备喷发的烈火，那么现代社会“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路人则像一团始终如一的闷火。

心理生成的这种转化势必通过落实在成人父母对儿童的教育上而完成文明的进程的个体重复。埃利亚斯借此融通了历史与现时、社会与个体的视角。他认为，在个体心理生成的过程之中造成了许多心理疾病。当然，真正表现出来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隐蔽性的。整个社会的危险是少了，但也逐渐失去了令人兴奋、动情、愉悦的因素。日常生活中所丧失的东西，通过梦、书籍、艺术、体育运动等创造得到了替代性的重新体现[17]。

埃利亚斯在探讨心理生成时虽然受到了弗洛伊德的许多启发，但他反对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作出截然区分，反对简单地诉诸抑制机制。他认为，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野是一种历史过程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墙只是不断增厚而已[18]。在更为简单（但绝非粗糙或缺乏社会型塑作用）的社会当中，基本的冲动与人的意识之间比较容易相互渗透和沟通。而“文明化这一概念的关键即在于：它是个体不断趋向于以自己与他人的社会生活为取向，趋于稳定和均衡的自我调控，以使每一个参与其间的人乃至整个人群可以增进生活当中的愉悦及生活质量，从而也使每一个甘心自我调控的人本身更有保障获得愉悦与幸福”[19]。

第三节　过程性视角的发展

许多人在读解埃利亚斯时，过于偏重他的《文明的进程》甚至只限于第一卷。其实，埃利亚斯一生的著述涉及面极为广泛，当然，这些作品始终贯彻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一、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

在《文明化过程》的最后,埃利亚斯已经开始着手探讨有关社会不平等、权力机会、人格结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表达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要以动态过程的型塑观来看权力,在由社会的各种相互依赖所组成的网络这一背景之中,结合人的人格结构来理解社会阶级的区隔。

从1958年到60年代早期,埃利亚斯和学生斯科特森合作,在莱斯特附近的小镇做了社区调查,并于1965年出版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社区问题的一项社会学考察》。该小镇在调查时有居民五千人,分为三个区。甲区都是体面的大房子,居民主要是商人及各专业群体,即"中产阶级",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的区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居住区。而乙区和丙区居住的则都是工人和手工业者,但彼此看法不同。乙区是最大的一个区,是小镇的"中心",市政设施的所在地,和甲区同属"established";而丙区居民居处陋巷,自视劣等,不仅与其他区的人不相往来,而且自身内部也殊少交游,属于"outsiders"。

所谓的"established"和"outsiders"有着丰富的意涵。首先,它们并不直接对应于"定居者"与"外来者",因为先来后到与文化格局中的权力关系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20]。其次,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这两类群体理解为"局内人"与"局外人",因为虽然甲乙两区的居民把持了社区的公共舆论和管理决策,但丙区的人并非置身事外;相反,恰恰是由于后者"积极"认同于公共舆论强加于自身的"污名",并通过青少年辍学之类的再生产机制,亲自参与了这种权力关系格局的构型。也就是说,在这整个"局"中,有的只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内局群体"与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的"外局群体"。"外局群体"与"内局群体"的地位一样牢靠,只是前者更多地想要迁出这个社区罢了。

埃利亚斯及其学生集中分析了所谓的"闲言碎语"(gossip)。它在社区里可以通过小报的社会新闻、公共场所(如酒吧、聚会)的闲谈和(更多的)走亲访友中闲扯的家长里短等等渠道进行制造和传播。他们发现,"内局群体"的成员一般是以对他人"不遵从"社会规范的行为表示厌恶和震惊,来显示对自己所属群体(即"我群")行为规范诚心诚意的遵从。而"外局群体"的人则对自己所属群体中如此多的"不良行为"惭愧不已,更加信服其他群体(即"他群")的品行高洁。

埃利亚斯等敏锐地指出:这里存在一个信息选择的过程。对于他群,是尽可能选取最坏的并加以扩大,即对他群形象的贬损化(denigration);而对于我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群，则是尽可能选取最好的并加以扩大，即对我群形象的理想化（idealization）。由于内局群体更多地控制了文化的公共性合法表达渠道，更因为声名的逐步固化后产生的心理认同，使上述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外局群体那里得不到体现，或者说是受到了他们自己以及内局群体的共同抑制。

大致说来，人的心理、信息制造与传递、文化表达和权力关系格局存在以下关系：权力不均衡的关系若是稳定，我群成员自我感觉地位稳固（即对自己拥有优越性的信心很强），则对他群（及我群）看法的扭曲程度就不会太大，想象与现实相距不远；反之，当权力关系不甚稳定、地位受威胁感增强时，内在的压力及竞争就会产生一种共同信念，导致走向极端的幻觉和刻板印象。

居于劣势的外局群体为什么不反抗呢？原因很多，一是缺乏权力控制和文化表达的渠道，比如信息控制（或者说是舆论的垄断）、内部通婚达成的团结等等；二是索性以更坏的举止以示反抗（比如青少年的吸毒、辍学；男人的酗酒；女人的邋遢、骂街）；三是在强大而一致的舆论下自我产生羞耻感，觉得“闲言碎语”有道理（想一想，“那事情”就发生在街坊邻居家里！）[21]。

二、群体关系研究的推广

埃利亚斯对群体关系的研究绝不仅限于小镇社区。可以说，这项研究渗透着他对少年时作为犹太人居住在德国城市的体验的反思，是流亡巴黎期间撰写有关胡格诺教徒被逐出法国的研究的延续，也是渴望在更大层面上探讨反犹主义的社会生成的体现。

埃利亚斯反对在静态、固在、共识的预设基础上，来使用“地位”、“等级”、“等级秩序”这样的一些主导概念来考察群体关系。他也同样避免用“精英”，他认为这是预设了内局群体由于先天、固有、个人成就等因素，在某些方面具有合法的优越性。人们或许会说，上面所说的那个小镇的情况完全可以用“偏见”或“歧视”来解释，或者干脆诉诸心理因素。但他主张，必须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探究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的关系问题。在分析一些固定的劣势群体（即始终处于文化表达与权力关系格局外缘），比如日本和印度的贱民，或者妇女和黑人时，我们可以研究社会是如何将这种“污名”归之于生物的乃至道德的本性，又是怎样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固化，反过来根据人的群体从属来判定他（她）的本性。

埃利亚斯在1935年论胡格诺教徒的论文中，就拿犹太人逃离希特勒德国与胡格诺教徒被逐离法国相比，就其个人遭遇而言，他当然可以通过归咎他人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但他所致力的，是将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社会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程,而不是单独个人的动机、意图及行动的结果。一个群体能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有效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这完全是两个群体之间特定的权力关系的结果。

当然,更大的背景是各个群体的关系日益紧密,被卷进一个细密的网络之中。这就使这一研究与他的整个著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以来,许多昔日的劣势群体(外局群体,比如工人、殖民地人民、黑人、妇女、同性恋者)开始意识到这种不均衡关系的不合理性(甚至才开始意识到这种不均衡关系的存在),这背后是权力关系格局的改变,而权力关系格局又反过来受到这种意识改变及文化表达渠道拓展的进一步推动。这和功能民主化的过程也是分不开的。相互依赖的链条越来越长,越来越分化,群体之内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分化差别也逐渐减少,特定角色的承担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愈益增强,乃至彼此间都有所控制。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新的不平等也仍在不断产生[22]。

总结一下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关系分析的方法步骤:

1. 考察彼此相互依赖的方式,把握群体组合构型之中主要的权力平衡态势。

2. 确定权力不平衡的倾斜程度、稳定性、趋向、对象、各方的需求、表达的渠道。

3. 考察在彼此追求满足需求的过程之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垄断控制力(在资源和文化表达方面的剥夺能力)。

4. 区分两种情况:一是权力非常不均衡,此时有可能产生群体卡理斯玛或群体污名;可以探究污名化过程,以及外局群体对内局群体为自身塑造的形象的内化(退却与认可);二是权力关系格局发生变动,产生功能民主化、平等化,出现对抗、反叛乃至通向解放[23]。

三、运动与暴力

60年代开始,埃利亚斯在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邓宁(E. Dunning)对体育运动的研究兴趣(他后来主持了对足球流氓的系列研究)引起了埃利亚斯对这一领域的关注,甚至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埃利亚斯在英语世界里主要是作为一位研究体育运动和闲暇生活的社会学家而出名的[24]。与邓宁合作的成果结集于1986年出版,题为《寻求刺激: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运动与闲暇消遣》。

此书的总体假设是:随着文明的进程的演变,人们普遍有了一种闲暇观:闲暇成了目的的手段,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但埃利亚斯反对像邓宁那样,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在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之间作出两极区分，因为这预设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而闲暇是不正当的。而且，在闲暇与工作时间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分布。

埃利亚斯等人认为，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是身体的直接对抗逐渐下降，“残忍”的暴力被模拟的对抗所代替，人们有所控制地制造“紧张刺激”，在规则作用的约束之下进行。在整个文明的进程之中，对暴力手段的控制逐渐体现出理性化和长期预见化的趋势。在对英国历史上专门的体育运动的社会生成过程（尤其是规则的出现）进行考察时，埃利亚斯出人意料地将其与英国的议会制度的巩固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种过程都必须以参与者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某种转变为基础，即我们在上文中一再指出的“理性化”、“心理化”等等。而且，对此问题的考察更将我们引向他对情感问题的分析。

运动与闲暇不仅仅是为了释放其他生活领域当中产生的张力，也是创造使人愉悦的兴奋、激动。这就等于在现代社会当中，在（自愿接受）文明化过程的诸多约束的同时，开辟出一块飞地，可以允许放松对情感约束的控制，而这种放松既能给人带来莫大的愉悦，本身又是受到控制的、是“有度的”，我们姑且称之为“有控宣泄”。在这种宣泄之中交织着例行化与非例行化的因素，人们借此有意无意地努力在例行活动当中创造出激情来。另一对彼此消长的因素是外在控制与自我约束：在自我约束的动力逐渐根深蒂固的同时，外在控制也表现出放松的反向趋势。人们创造出一些状似现实生活的场景，体验其中的兴奋，但没有切实的危险。一句话，“在一个缺乏兴奋的社会里寻求兴奋”[25]。

总之，在体育运动和闲暇安排之中深刻地体现出需求与控制的张力协调过程。当然，“这种张力的平衡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各个社会里都有所不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从动物性的驱力到最崇高的情感，整个情感序列都得到了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被强烈地内化了。情感的外在控制相对较为温和，在闲暇活动中得到公众认可的情感激发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也是温和的。简言之，两者都需要情感的高度成熟”[26]。

四、《莫扎特》与《德国人》

《莫扎特：一位天才的画像》严格来说是一本文集，是在埃利亚斯各个时期有关这位音乐天才的讲演、笔记、草稿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埃利亚斯以他一贯的融合“社会生成”与“心理生成”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这位天才艺术大师的一生，典型地反映了某种特殊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在当时形成伊始之时颇为独特，但在今天的人看来，会误以为只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若以过程的视角替代静态的观念，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在静态的视角之下，人们急于把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各种历史人物塞入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构想出来的各种固定的范畴之中,如果实在不能切合,则归入所谓的"过渡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才的社会学"这个题目是矛盾的,因为埃利亚斯的社会学分析所要做的,就是破除所谓"天才"的神秘性,揭示这样的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如何会产生、如何可以避免。他在这部著作里运用了自己的其他许多有关思想: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关系;早期有关"庸俗风格"的论文中对流行艺术风格的质疑;以及在有关非洲雕刻的文章中对"手艺人的艺术"和"艺术家的艺术"的探讨。

对于莫扎特来说,最看重的是公众对自己音乐的爱和爱妻对自己的爱,但随着新奇感的淡却,维也纳宫廷和大众逐渐丧失了对这位昔日曾被他们作为音乐神童而抬上天的"宠物"的兴趣;而爱妻也对这位"失宠"的"怪僻人物"日渐冷淡。生活丧失了意义,使这位如此渴望爱和被爱的人迅速地衰亡,《安魂曲》预示他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了死亡。埃利亚斯指出:"要想理解一个人,就得了解他(她)渴望实现的那些最根本的愿望。一个人的生活对其本人而言是否具有意义,得看他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这些愿望。不过,这些愿望可不是先于所有的经验而根植在某人的体内的,而是脱胎于孩提时代与其他人共同度过的生活,并年复一年地逐渐固定下来,塑造了生活的历程。当然,有时也会在突发的经验事件之中产生出这样的愿望来。无疑,人们对这些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愿望本身时常是无所察觉的,甚至它们的实现与否或程度大小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自己,因为它们总是以他人为取向,以人们彼此共同构成的社会关联为取向的。"[27]

早在《文明的进程》第二卷当中,埃利亚斯就指出,资产阶级作为外局群体处于不断上升之中,统治阶级(宫廷贵族)作为内局群体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两者之间的权力均衡不断变化。莫扎特的一生极其典型地体现出:随着整个欧洲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濒临结束(即宫廷贵族为来自不同社会等级的艺术家规定标准以维持权力的总体分配),为宫廷服务的一位艺术家会有怎样的命运。因此,埃利亚斯说:"这项考察不是一种历史叙事,而是更加详细地阐发有关构型的可证实的理论模型。这种构型是由一个人,即18世纪的一位艺术家,在与同时代其他社会人物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形成的"[28]。为此他着重分析了莫扎特同时具有的两种行为方式和性格(宫廷式、资产阶级式)的冲突。莫扎特自己对宫廷的态度就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同宫廷贵族及其鉴赏趣味,另一方面又憎恨后者给予他的羞辱。后来,莫扎特虽然逐渐认识到整个贵族世界对他的排斥,却无法也不愿接受和培养圆滑与豁达的态度及技巧,所以无法应付宫廷之

INSTITUTE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中处满机关的辞令争斗。这又回到了《宫廷社会》的分析。

《德国人：十九、二十世纪的权力斗争与惯习发展》也是一部在埃利亚斯去世后整理出版的论文集。埃利亚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趣、二战的爆发、纳粹集中营的出现、两德分裂等等百年来德国人遭遇到的“命运”的原因溯源。通过分析德国长期的国家形成过程与德国人民族惯习的型塑发展，埃利亚斯试图揭示希特勒时期的去文明化过程的起因。在《莫扎特》中，他关注的主要是社会权力斗争如何影响了身处其中的个人的命运，而《德国人》的分析则是要揭示各类历史事件、权力斗争、国家成就、民族挫败等的长期过程，以及这些“宏观”的东西如何在整个民族的成员的集体人格中积淀下来[29]。《德国人》中各篇论文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但综合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向我们证明：本世纪以来的灾难事迹并不足以推翻文明进程论，相反，文明进程理论本身就可以更好地说明像大屠杀这样的去文明化过程，将它们放在长期历史背景之下，并表明它们之所以发生在某一具体时间、地点、文化中的缘由，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归为整个现代世界的普遍痼疾。

曼内尔认为，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于30年代末的《文明化过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心态下写的，而《德国人》不过是写明了当年隐含不露的东西[30]。

第四节　投入与超脱：知识的社会生成

1956年，埃利亚斯在《英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投入与超脱的有关问题》，第一次集中阐述了人类知识长期发展（以及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科学的兴起）的理论，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又陆续写了一些论文，对卡尔·波普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作了批判。对此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他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和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论述。1983年发表了长文《漩涡之中的渔夫》，1987年出版英文版的《投入与超脱》，即将出版的又一部有关论文集（暂名为《人的形象》）收入了《社会学的社会生成》（1962）、《知识社会学的新观照》（1971）、《迈向社会过程的新理论》（1977）、《科学诸建制》（1982）以及《论自然》（1986）。此外，有关阐述还可见《文明化过程》1968年版的序言，《宫廷社会》的序《社会学与历史学》[31]，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的大部分论述。此外还可参考1982年论乌托邦的两篇文章[3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一、破除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

埃利亚斯反对简单地提客观性—主观性的静态二元对立,强调这只是一个续谱。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是将分析视角扩展到人的知识与行为的整体。总的说来,埃利亚斯认为存在以下这样的关系:

如果以"投入"(involvement)和"超脱"(detachment)作为评判的两个向度,超脱越多,越偏向客观取向,现实适当性(reality-adequacy)越重(即越以贴近现实为上),与自主性相对而言的"异治性"也就越重,越倾向于站在"他们"或"他"的角度言谈思考,即"它—功能"(It-functions);相反,投入越多,越偏向主观的取向,思考时幻象的成分、魔幻—神话性的思维就越多,自主性也越强,越倾向于以"我们"的角度言谈思考(埃利亚斯称之为"我们—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绝对的"投入"与"超脱",它们都是相互融合的,只是彼此的权重有所不同而已,其各自对应的特征也只是发生比重的变化。

埃利亚斯明确指出,除了初生的婴儿和神智完全丧失的人,无论是什么人,都不存在绝对的"理性"与"非理性"、"客观"与"主观"。而且,恰恰是这两个方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这种均衡随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个人乃至情境都各有不同。埃利亚斯之所以单单采用"投入"与"超脱"这两个术语来带出其他的维度,是为了避免将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截然分开,避免用纯粹的因果关联去推断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埃利亚斯认为,以往各种关于科学知识的学说都未能充分说明科学的知识是如何从非科学的知识之中发展出来的。用现代人已知的、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和范畴去理解以往未知之时的思维,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比如,在现代工业—科学社会,人们很自然地区分生命体与无生命体,所以很难理解古代人们对大自然和自身关系的把握。所谓幻象与现实、梦境与真实的区别,都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而固定下来的产物。比照儿童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对想象、游戏等的态度的转变,也无非是再一次重复了整个人类社会所走过的道路。但神话式的思维并未完全泯灭,而是潜伏下来,通过各种变化机制,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大众对体育运动、科幻小说、占星术之类的诉求之中,即可体现出这一点。

二、知识的"科学化"

如果说,儿童在其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在知识的科学化方面沿循了社会的标准,那么,这种社会的标准又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呢?在这一点上,埃利亚斯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1922

将他的投入与超脱关系的学说与社会生成和心理生成的学说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人类知识（包括思维方式）的“科学化”，是与理性化、先见化、心理化、自我控制的增强等长期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其中，个体人格结构的发展又是与社会的发展融合在一起的。

在《宫廷社会》和《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知道：越是能够自我控制，对周遭的情势进行与自身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就越是能够对过程进行控制[33]。或者说，自我控制的水平与过程控制的水平是彼此依赖、互为补充的。所谓“理性”，最根本的特征即为，以行为的“迂曲”推延报偿的直接获取，换取更长远的满足，在现有手段与未来目的之间建立起符号化的关联，也就是说可以得出某种“理论”或“模式”，并借此指引行动。

这样的“迂曲”行为，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科学。科学需要长期的、超脱的视角和实践途径。我们大致可以说，自然科学中的“纯理论”相对于“应用科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相对于社会科学，都更多地体现出这样的“迂曲”取向。但在任何情况下，所谓的“纯理论”都只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纯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知识总是同时具备投入与超脱的性质、客体取向和主体取向。在工业社会里，人们日益（被迫）接受“科学的”思维方式，表面上不直接关涉任一特定群体的利益，但这些“科学”思维本身都是多年漫长争战的结果。知识多的很难理解知识少的人的思维方式，就像内局群体很难理解外局群体。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在于各个人群看待问题有什么不同的方式，还要追问其原因。比如“原始人”在大自然的种种现象面前觉得不安全，所以把自身的神话想象投入其中，无法达到较高程度的超脱，从而更加无法控制。非人化的因果关联解释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这不能满足他们的情感和认知方面的需求。一句话，人们用来获取知识的方式是和他们业已掌握的知识的内涵实质分不开的，尤其是和他们对所处世界的基本观照分不开。

埃利亚斯提出了“基本控制的三重体系”（triad of basic control），借以说明知识与长期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界定与衡量一个社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

（1）对非人力量及事件（自然力）行使控制的能力——大致等于技术发展；

（2）对人际关系及事件（社会力）行使控制的能力；

（3）对作为个人的自己（即每一个社会成员）行使控制的能力。

这三种控制是彼此依赖地发展的，但它们并不存在平行发展的必然性。比如悖谬的是，第（1）种能力的发展时常会有碍于第（2）、（3）种能力的发展，甚至有时会出现倒退的现象。20 世纪可谓是技术兴盛、科学昌明的时代，但人们对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自己所处的社会、对自己的内心的了解与主宰程度难道就比以前高吗?

三、科学建制等级的社会生成

在19世纪上半叶,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发展的序列图式,社会学是作为最高的一门科学,统领各门学科的。但今天,人们(包括社会学家自己),有意无意地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觉得一门学问越是体系化、精确化,越是能够借助严密的实验加以证实或证伪,就越称得上是一门科学。如此眼光来看,物理学、数学这样的学问自然是最科学的,而社会科学则未免次之,其中经济学还好些,社会学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当然是等而下之了。至于历史、哲学,比较不具可比性,况且历史悠久、学统深厚,也不用与它者一争短长。

埃利亚斯不同意所谓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比社会科学高的说法,提出要全面地理解这两种科学的性质,考察它们的研究主体和对象的性质,以及各自的投入与超脱的比重。他明确指出: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同样笼罩着群体利益、我群幻象的迷障。他以地心说代替日心说的过程为例,生动地说明了在自然科学的进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的感情偏好和幻想因素。像达尔文、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当初都曾经由于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的顾影自怜,而被科学的名义冠以异邪的帽子。在知识的传承继替过程中,社会的权力均衡状况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实际的技术进展、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比重等等)。

为什么知识成了争夺的关键目标?埃利亚斯的解释是:知识的核心社会功能便是取向(orientation)方式,"由于社会中每一个成员个人的取向都取决于自己可资利用的取向方式,因此,那些有能力垄断该社会取向方式的监督、传输和发展的群体便有机会拥有相当可观的权力,如果垄断是围绕某个核心而组织起来的,这种情况就体现得尤为明显"[34]。

总而言之,如果要解释科学客观性的产生,或者是揭示这只是一种发展而来的可能性,就必须考察中世纪以来教会对知识机制垄断的丧失,考察科学建制的逐步形成,新的专业化取向方式的出现,以及相对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当然,这种转变只是逐步发生的,早期的科学家还都或多或少地负有宗教的情怀。

而且,人们总是想当然地把发现隐匿在可观察的变化背后的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即所谓"法则"——当做人类知识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法则"并非用符号来反映被观察事件之间关系的唯一方式,也不是人类社会知识代代传承的唯一符号化方式,它只是某种神学体系和后来的经典物理学的独特方式(只是这两者取证的途径不同,前者是通过经文解说和天启,后者是通过实验)。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埃利亚斯因此指出，各门科学观察的对象性质不同，所采用的概念、理论和说明的类型也都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不如自然科学，或者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就要比社会学高。他据此对科学发展史的、理论类型的演变作了分析，认为是从平面到三个维度（空间），再到包含四个维度（时间）的过程式理论（他认为，达尔文、孔德和马克思是过程理论的先驱）。社会科学中的过程理论比自然科学更多出第五个维度，即体验，包括人在可直接观察到的"行为性"特征之外，"体验性"的思维、情感、心理驱力等。

在社会科学里，存在着自我的对象化或远距化、心理化。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常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面临着双重解释的问题。埃利亚斯将这种双重解释、这种人对自己的观察活动的自我反思与整个科学知识的出现联系起来，与人类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另外，由于社会事件和变迁显然与人的自愿行动和计划有关联，所以相比自然事件，人们更难理解为什么表现出明确方向的结构变迁过程并不出自某一个人的计划或意图。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许多彼此依赖的人交织在网络之中，他们各自计划和意图的事件会逐渐发展成有一定结构的、表现出方向性的变迁过程，而这种过程又有可能出乎任何一个人的意料。

那么，社会科学作为揭示这种无人计划但有一定结构的过程的科学，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埃利亚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正是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人们开始认识到：没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或群体能够在愈益复杂、多向和相互依赖的权力网络之中取得绝对的主宰地位。因此，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绝不仅是对特定个人或群体行为的揭示。

埃利亚斯在1962年的《社会学的社会生成》一文中，指出社会学不仅仅是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知识上的反映，而是整个社会自身转变的反映（比如工业化、功能民主化），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开始出现的反映。以往的社会思想家如伏尔泰、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都诉诸某个权势之人来解释社会事件。而魁奈、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则开始通过"市场力量"来解释社会过程（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学的起源与现代经济学是分不开的）。但他们仍始终用纯粹的"经济人"来作为预设，未能看到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具体历史的形成。因此埃利亚斯认为，马克思对纯粹"经济人"预设的揭露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从"封闭的人"到"开放的人"

埃利亚斯还精辟地指出，偏于哲学的知识论传统最趋近超脱的一端，而社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会学性的知识论传统则最趋近投入的一端。前者思考的是如何获取未被扭曲的有关现实的知识,后者关注的则是有关现实的知识是如何被扭曲的。

"封闭的人"(homo clausus)是埃利亚斯毕生抨击的目标。他从博士论文开始便认为,莱布尼茨式的单子外视观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人类对知识的探求,以至于即使超出了自我的视角,其问题也只在于如何认识其他单子的思维和认识。人成了"思考着的雕像",是"缺乏我群形象的一个个我"(we-less I's)。埃利亚斯独辟蹊径,指出"封闭的人"是长期历史发展起来的文明化自我控制的"容器",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他提出应该代之以"开放的人"(homines aperti)。

埃利亚斯还具体分析了"社会学人"(homo sociologicus)。他指出:无论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韦伯的行动类型学,还是帕森斯"黑箱式"的行动者人格体系,都渗透着"封闭的人"的思考倾向。埃利亚斯批评道:"静止的自我形象,个体行动者,从整个成长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成年人,在帕森斯理论所借用的精神分析观念中,这些东西都在毫无中介的情况下共存一处,而精神分析观念原本针对的是成为一位成年人的过程而非成年的状态,是在处于与其他个人不可分解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并作为一个开放性过程的个人"[35]。这一批评完全可以用来比照帕森斯之外的许多社会学家。正是因为埃利亚斯认为所谓"黑箱"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严格区分只是一种虚幻的区分,所以他才会同时反对涂尔干式的高度客观主义和现象学的高度主观主义[36]。

埃利亚斯对哲学"传统"的这种批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反击,被指为"非哲学"的。埃利亚斯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学的理论)被指为"非哲学"的会是一种批评,而且社会学(家)自身也认为这是一种批评?他在"科学诸建制"一文里通过外局群体与内局群体的关系反思了这一问题。在整个科学建制专业体系里,各门"学问"争相专业化,学科之间彼此争斗,造成交流困难。等级低者常常是急于寻求声名显赫的"祖师",以等级高者的批评为重,并以后者典型为典范(如社会学对两极——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看法)。结果是以我群印象的凸显(其实是丧失)、技术方法对问题意识的消解为代价。

第五节 整体过程观照下的人类发展

埃利亚斯终其一生都强调,他所考察的欧洲历史绝不是文明化过程的唯一表现形式。但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文明化过程无疑是人类的一项共同特征。按照古兹布洛姆的说法,文明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1）每个人自出生始便经历的过程，即通常所谓的“社会化”、“濡化”（enculturation）、“人格形成”等，与生物成熟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

（2）特定社会中有关行为、思维、情感方面的社会规范的发展，注意不要把所谓“社会”的过程与“个人”的过程截然区分开来，也就是说（1）与（2）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过程，因为每一个人一生的学习过程都是整个社会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埃利亚斯称之为“个体生成”与“社会生成”的相互融合）；

（3）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化过程，每一个单个社会的文明化过程都是其组成部分，逐渐形成人类整体的一些独有能力，比如火的使用，言说能力，用木头、石头、金属等制造工具和武器，以及知识的增长等等[37]。

一、符号理论

社会学家们常常忽视了第三点，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人类在生物性上来说同属于一个种类，进化是非常缓慢的。而其下的具体生存求适就是文化变异的表现了。埃利亚斯因此认为，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研究：究竟是人类所具有的哪些生物性特征，赋予人类某种超越于动物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从经验中习得知识，并一代代传承下去，根据环境的变化改变群体生活方式，表现出“自我驯化”（self-domestication）的过程。一句话，“人类的何种生物特性创造了历史？”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体现出埃利亚斯反对“封闭的人”的一以贯之的立场。他指出，在看待身心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方面是孤立主义的二元论（isolationistdualism），比如在德国所谓的精神科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心智和肉体是截然两分的，是站在“封闭的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还原主义的一元论（reductionist monism），比如行为主义、民族人种学、社会生物学[38]。

埃利亚斯认为应该采取过程性的视角，理解总体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连续性与独特的结构特征，融会自然的维度与社会文化的维度，生理的维度与心智的维度。在这样的融会之中，人类的特殊性体现在生物进化史上第一次拥有如许的习得能力，使知识的增长无需生物性方面进一步的进化；而且，相较其他动物而言，人类的习得行为比重第一次超过了非习得（遗传天赋）的能力。正是这一点赋予人类极大的优越性，埃利亚斯称之为“符号解放”（symbolic emancipation），即人类在为求得沟通而发出声音时，逐渐摆脱了大多是非习得的或者说天生的信号的束缚，习得的形式逐渐固定下来，并慢慢占了上风[39]。这样的素质使人类渐渐走上了符号动物的道路。人类越来越多地获得习得能力、综合能力（在各种符号的使用之间建立关联），以及代际之间通过符号形式传承知识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的能力,更好地与环境求得调适。

但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的关系绝不是单向的。埃利亚斯同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社会压力的增强,认知的需求和能力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也反过来促使社会知识的存储逐渐脱离生物进化。同时,先天能力比重的下降也促使人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比其他动物学得更多。

埃利亚斯认为,不能把所谓的"本质",即"自然"(nature),看成无非是那些通过储存下来、被记忆住的经验形成的固定不变的人类特征。他通过对婴儿语言能力和情感激发的考察,指出一切属征的获得和发展都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综合。他尤其重视对情感的研究[40],认为任何成人的情感都不是纯然先天传承的固定反应模式,而是同时包含了身体(生理)、行为、感情等方面的属性。脸及其在人际交往间的核心地位,是埃利亚斯的分析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总之,不可逆的生物进化[41]与可逆的社会发展不可分割。

总之,在文明的进程中,借助运用符号的能力,学习自我控制(而不是缺乏本能),将外在约束转为内在约束,这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性。在这过程中,普遍体现出报偿的推延、迂曲的超脱和符号的预期。技术、心智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纠缠在一起:生物的进化、符号的发展、组织的扩大、情感的细密……埃利亚斯的符号理论就是这样和他的其他学说勾连一体。

二、论时间

在埃利亚斯对整个人类文明化过程的具体分析中,最系统的要算是《论时间》了。他把《论时间》与《文明化过程》和有关知识的社会学理论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42]。

埃利亚斯认为,时间绝非简单的自然因素,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时间和计时(timing),前提是人类不仅能够运用符号,并且还拥有在代际之间积累知识的能力。只有在这种人类特有的综合能力,即通过不同的符号使用建立联系之下,人类才能在发生在所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时间序列感"。今天被我们作为"时间"而加以概念化的理解和体验的,正是人类的一种知识积淀,一种取向手段,是通过漫长的代际习得过程体验发展而来的。所谓测算"时间",并不是说存在某种固定先在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探知,去建立联系。"计时"更重要的是一种建立联系的能力。

因此说来,所谓的"时间"只是供人们理解和测度的一种符号,但其符合"现实"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很难分辨符号与现实。时间之所以会被作为"客观现实",是因为它和语言一样,必须在共同的执行之中方能发挥其效能,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1922

而且表面上它也具有不为外力所动的自然过程的特征。人们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人生与时间的流逝挂起钩来。

在非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里，对时间的意识体现为更具体的图式，比如通过月亮的圆缺来表示“月”；没有必要和可能产生严格稳定的时间尺度；社会生活里诉诸时间计算的程度也比较低；钟点、日历和纪元之间的关联也是松散的，总之，缺乏现代的直线流式的连续时间观。而现代社会里的人一般是不假思索地把时间理解为某种类似于河流的直线流（或者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想时间是什么东西）。他们很难弄明白，自己这样的理解只不过是多种可能性之一，是文明型塑的产物。

从原始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现代工业社会，逐渐产生时间精密化的需要（也就有了可能），可以和必须精确预见的时间由点（农业社会中的播种、收获、祭祀时节）到面和到流（国家的出现促成了历法的出现，铁路统一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时间，而电报电讯更使时间拥有了国际化的形式，典型的例子是钟表上秒针的出现，地方教堂的钟声开始根据收音机里格林尼治时间来调准）。长期较为稳定的国家单位的出现，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单向的流动来体验的前提。随着人际交往网络的日渐延长、细密，与他人的协调日渐重要，时间方面的自我调控也日渐严密，时间的划分也就越来越重要、严格、“准确”。现代工业社会的工厂制度和这一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日历、时刻表、钟表、手表（从钟表到手表是一项意味深长的发展）、个人记事本等等，不仅体现出对时间的社会约束越来越强，而且也表现出社会约束逐渐转化为自我约束的过程（比如儿童入厕训练）。总之，时间绝不只是所谓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时间体现出第五种维度：人的意识和体验。

三、生存单元与人类的整合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埃利亚斯晚年试图以比《文明的进程》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宽广的地域范围，探讨整个人类的整合问题。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是各个生存单元（survival units）的规模越来越大，彼此对抗的集团规模也越来越大。但他否认人类具有侵犯的天性，也不认为人类只能借助暴力手段来解决群间冲突，相反，他的著作始终表明人类的整个历史怎样表现出暴力性逐渐得到遏制的倾向。

尽管埃利亚斯成功地预见到了超出国界乃至洲界的协调组织越来越普遍，也看到了各个国家的单独行动越来越需要考虑到（和牵涉到）更多的国家，但他战前对最后出现世界性统一政府的预见，目前看来还是颇为遥远（当然他自己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基础)。他在晚年对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的对抗实质的分析中,利用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我群与他群)的视角,认为两个超级大国集团之间的对抗关系(相互约束的构型)存在自我增强(self-escalating)的趋势。相互的威胁增强了情感的幻象。而核战争的威慑只是在更大的"国内"范围内寻求"和平"解决的又一过程的开始。

第六节 "过程"社会学——原则与影响

一、"构型"与"过程"

尽管埃利亚斯早在60年代早期有关体育运动与暴力的论文以及《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中就已提出了"configuration",并集中在《什么是社会学?》中提出了"figuration",但他非常反对把他的思想因此被归为"构型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他更注重过程性的、动力性的性质,而不是像"社会结构"、"社会系统"之类静态的、外在于个人、不受个人控制的物化概念,也就是说,更注重的是"型构"而不是"构型"。

我们可以简要地将"型构"规定为"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中的权力均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这个不同寻常的词既成为埃利亚斯的攻击者所指责的目标,也成了他一些追随者自我认定的标签,但这样潜伏着很大的隐患,会使埃利亚斯的努力又沦为无非是想建立一个学派,而且一个新概念并不能彻底改变他穷一生之力予以揭示的"不言自明"的思维惯习,更不能说解决所谓"宏观"与"微观"之类虚幻的二元对立的连接问题。因此,埃利亚斯宁愿使用一个较为普通的词:"过程"(process)。它不太容易被视为静态物化的东西,也不会因其深奥而被借作标签。

埃利亚斯向来反对区分所谓的"理论"、"经验研究"和"方法论",因此很少(面对批评)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纲要性的总结。唯一的例外或许是《什么是社会学?》。埃利亚斯认为关键是要转变人们思考问题所预设的内核范畴,揭示许多观念思维方式将过程还原为状态(process-reduction)这一点。这种还原是与西方哲学和神学思想传统分不开的,最稳定不变的东西被认为是最真实的,也是最具意义的。在社会学里则表现为一些"不言自明"的观念区分,如"行动者"与其行为,结构与过程,实体与关系等等。其中,埃利亚斯着力最多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揭示了在这种对立背后反映出的自我中心主义[43]。

埃利亚斯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从根本上认清人与人之间的关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系是和一个个分立的“个人”一样真切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用“……化”（比如埃利亚斯自己的“文明化”、“宫廷化”）之类的术语来展示过程性的视角只是一种表面的解救之途，即误以为概念在现实中有严格的对应。韦伯也看到了这种问题，但他的解决方法是“理念型”（ideal-type），埃利亚斯认为这反而容易导致“过程还原”，故此反其道而行之，使用“现实型”（real-type），比如“宫廷社会”。

二、行动网络的过程模拟

埃利亚斯对人类社会实际过程的基本认识是：人们以联合或对抗等多种不同的方式，在日益扩大并复杂化的网络中彼此依赖，相互之间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权力（不）均衡关系。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身处其间的每一个普通行动者，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都无法把握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发展过程。人与人之间行动的绞缠导致了所谓“社会的突生性质”，预期之外的后果被视为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现象，因为人们对自己身处型构的知识始终是不完满、不精确的。只有采取发展的视角，才能充分把握这些个人行动的绞缠综合如何产生了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控制（非出自其计划或预期）的“强制力”，并反过来构成和约束这些人的感知、意图和行动。

对于这样一种状况的一般形式和过程，埃利亚斯在《什么是社会学?》中通过逐步复杂化的“博弈模型”（game models）作出了生动的描述。作为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类比，博弈固然是一种失之简单的类比，但比起生物类比和机械类比来要好一些。此外，需注意埃利亚斯眼里的“理性”可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

埃利亚斯从两个博弈者的简单对抗开始分析，逐步加入新的参与者，其中又分出弱弱联合、弱强联合等许多具体情况。他认为：“如果彼此相互依赖的博弈者数目越来越多，对于每一个博弈者个人来说，博弈的型构、发展与方向都将日益变得含糊。无论博弈者作为个人如何有力量，他也会愈益失去对博弈的型构、发展与方向的控制。因此，从博弈者个人来说，一个包含越来越多的博弈者的交织网络，在发挥作用时将逐渐更多地表现出似乎有属于自身的生命在”[44]。而且，一旦博弈的模型大到相当含糊的程度，就会出现分裂、重组、分层等现象。从而需要重新树立行动网络的模拟状态。因此，社会学家在思考问题时，不要诉诸“结构的变迁”或“结构和过程”，而是要用“变迁的结构”或“过程的结构”。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三、社会学的任务

既然人类行动网络的日渐复杂化的发展会使任何一个人丧失对过程的控制,那么,个人何为?社会学家何为?埃利亚斯对此的回答是:"(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于最终使处于各种群体之中的人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和他人"[45]。而如前所述,人类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行为方式绝大多数来自于习得以及代际之间知识传承的重要性,因此,增进取向手段就成了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任务。社会学家要努力帮助处于型构中的人们获得自己的行动"地图",提供可能性的概貌。当然,这还得要等待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检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精确度量每一个独立个人为预设前提的问卷调查,即使可能揭示了整个过程结构的一些整体性特征,也存在一些根本的问题。

埃利亚斯拥有超常的综合取向和能力,并且能够在一生当中锲而不舍地坚持这种取向。在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学家们发展出精细的分析能力,也同时磨去了综合的雄心,不把自己的结论与较为宽广的人类型构的持续发展挂起钩来,简单地认为这相当于某种立法性的意识形态。而埃利亚斯认为"捣弄数字"与"鼓捣概念"同样不可取。在我们这个学科分工高度发达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知识的符号化程度相当高、相当综合的时代,很容易陷入以高度抽象的概念来求得地位安定的故步自封的陷阱。与此相比,埃利亚斯的努力可谓弥足珍贵。

四、挑战与影响

时近20世纪末的今天,在见证了古拉格群岛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所谓进步与发展的厚重意涵,体会到世界各国的不平等状况,"文明"与"不文明"再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事实陈述,而愈益彰显出权力关系掩盖下的价值判断实质。但20世纪也同时见证了各种礼仪规范的"开放"。所以,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可以用"文明的崩溃"或"去文明化"(decivilization)来概括。埃利亚斯反对简单的"野蛮化"论,比如在回答关于纳粹集中营的问题时,并不单纯诉诸人类的侵犯本性,而是从外局群体和内局群体的关系着手分析反犹主义的根源。指责他替20世纪的"野蛮"粉饰太平是不公平的,不要忘了,他的亲生母亲就死于奥斯威辛。

来自文化相对论立场的反驳则指出:是否真的能用一种统一的过程(无论是文明化还是去文明化)来描述世界各个地区的发展?有论者认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论是(单线)进化论者的论调,是进步论者的论调。但事实是埃利亚斯努力向我们指出,生物性或表面行为方面的差异并不等于种族上的优劣,而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是漫长社会型塑的结果。并且他也明确指出，自己所研究的只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埃利亚斯认为不能将发展视角连同单线进化理论一起抛弃，而是必须时刻记住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的不同。为了更精确地比较各个社会历史文化的所谓“渐进”(progression)与“倒退”(regression)，他提出了以下考察标准：

(1) 不同阶级、年龄、性别的人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时期的常规交往频率；

(2) 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在某一特定时间—空间序列中，个体成员形成的相互依赖链条的数量、长度、密度和强度；

(3) 社会中张力的核心均衡，功能分化的上升与权力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所导致的权力中心数量的增多；

(4) 三重控制(自然力、社会力及自我)的水平[46]。

埃利亚斯并不否认，在没有发展起暴力垄断机制的国家和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的地方，也同样存在“文明”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形态。他说的只是这些条件促进了西欧“文明化”过程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逐步增长。“文明”不是静止的固有状态，而是一种“变化过程”，国家的形成成为行为方式趋于“文明化”的条件和结果(就此而言，《文明的进程》的英译本更名为《文明化过程》也颇有道理)。

与“去文明化”相对的是，20 世纪也被许多人认为是逐步转向了“性开放社会”(permissive society)，广义上即宽容的社会。因此有论者指出，即使埃利亚斯所指出的趋势正确，在 20 世纪也出现了逆转的趋势，社会生活出现“非正式化”，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并未减弱，因此埃利亚斯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如果从短时间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不断地交替出现正式化与非正式化。况且，这种非正式化的开放是以高度的自我/他人的约束(及预期)为基础的，简言之，外在的权威控制转化为内在的良心控制[47]。总之，埃利亚斯不断强调，文明的进程不仅仅是自我控制的不断增长，而是外在约束与自我控制的平衡关系的变化，是控制关系的变化。

现在来谈埃利亚斯的影响似乎还为时尚早，但这位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偏出于主流的学者自 70 年代以来声名日盛且波及领域愈来愈广，却是有目共睹的[48]。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广开领域，成果卓著[49]。在德国，他晚年的主要著作和整理工作乃至许多访谈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作为知识分子天堂的法国，早在 70 年代《文明的进程》法文版的出版就为他带来了很盛的名声，该书登上了巴黎畅销书榜。布迪厄和夏蒂埃都很推崇他[50]。在意大利，尤其在 1988 年《个人的社会》因成为上年全欧最佳社会学书籍获第一届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阿玛菲"(Premio Europeo Amalfi)奖后,也颇为"得势"。但在整个英语世界,对埃利亚斯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薄弱的。《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 Society*)杂志俨然是受埃利亚斯影响或与其亲近的学者的阵地,但仍然是作为非主流社会学(或非主流社会理论)的学术刊物。而且人们更多地把埃利亚斯视为一位社会理论家,而不是像在西北欧等国的年轻学者那样,把他看做是可以对经验研究给出灵感激发的人物,积极在广泛的领域里贯彻其思路,验证其结论。此外,在将埃利亚斯与社会理论主流(至少是主流思想家)的思想联系起来方面,出现了一批优秀论文,如把埃利亚斯与福柯、戈夫曼、吉登斯、帕森斯等进行比较。但在美国,埃利亚斯的影响至今仍然很小。

无论如何,大致而言,对埃利亚斯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英语世界)还是十分片面的,人们过多地集中在《文明的进程》(甚至只是其第一卷)[51]。英美学界历史社会学的主流还是巴林顿·莫尔、斯考克波尔、蒂利等人,关注的是革命、社会动荡和阶级冲突,以斯考克波尔为代表的方法还是以比较而不是发展为主,注重的是找出内在的因果因素。受埃利亚斯影响最大的还得算研究情感的一批社会学家。曼内尔认为,以往的社会学基本为认知所主宰,在后工业社会,计算机化的组织理性显然容不下对情感的研究,情感时常只能不恰当地混迹于诸如态度、阶级身份、卡理斯玛之类的考察之中。60 年代之后对情感表现的重视、对因果线性逻辑的抵触和对自我的张扬促成了"情感转向"。这些或许可说是埃利亚斯的影响日益深远的一点重要原因。

无论是就单本著作还是就全部作品而言,阅读埃利亚斯有时都会使人感到重复乃至啰唆,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晚年特殊的口述写作方式使然,但他的学说确实是在反复的探讨中达到螺旋向上或深化的效果,很难离析出哪一本书专门讨论哪一方面的观点。究其一生,埃利亚斯都居于传统之外,较少参引。他的语言浅近,多举譬喻,术语集中,立场鲜明且一以贯之。他的"理论—经验"结合致密,很难概括出条条框框。因此,对他的最好读解应该留待我们自己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所开辟的专门研究。

这位一生中从未投过票,也未参加过任何党派的学者认为,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蕴涵着自我欺骗与对社会现实的歪曲:"我坚信,人类的疾苦正应归咎于他们被不现实的观念所驱使。"因此,清除所有神话式的思维方式是他自认的职责。人类需要神话,但可以通过写诗来实现(他自己就出版了诗集),而不要将这种思维方式贯彻在社会生活之中。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寻找长期历史过程的影响。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他并未受到正统学校教育(包括学术生涯)的负面影响,相反却受惠于远离主流社会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的处境，以超然态度敏锐观察意识形态的扭曲和社会权力关系的掩盖与自我掩盖。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埃利亚斯早些步入正规学术生涯会怎样？但这样的论题是毫无意义的。面对这位平凡的人物，我们只能抱之以冷静反观自身的态度。毕竟，我们都承受着高度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与重负，而且似乎还乐在其中或者浑然不觉。

注　释

〔1〕 本章有关埃利亚斯的生平及其回顾的资料，主要依据 Elias, N., *Reflections on a Life*, Polity, 1994; Mennell, S.,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 1911，以及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4 (2—3)。曼内尔的这本研究著作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学术传记，有助于全面了解埃利亚斯除《文明的进程》之外丰富多彩的著述，以及这位“边缘”人物与现当代思潮的多方面联系。

〔2〕 后来他在晚年回顾时，认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始终是双重性的。是犹太小团体的成员，还是德国社会的一分子？这种设问方式所反映的身份认同困惑，只是随其后社会政治局势以及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才显露出来的。而后一点原因正牵涉到埃利亚斯有关科学“客观性”的社会生成过程的研究。

〔3〕 值得注意的是：曼海姆与阿尔弗雷德·韦伯几近势不两立：一个是锋芒毕露的新秀，深受研究生与年轻教师的喜爱；一个是享誉士林的前辈，不甘于学术声望的衰落。这种关系类似于日后索罗金和帕森斯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关系。

〔4〕 他的授课资格论文三十六年以后发表，即 Elias, N., *The Court Society*, Pantheon Books, 1969.

〔5〕 此书 1969 年重版后方才引起轰动：1978 年和 1982 年分别出了英文两卷本，1994 年出了一卷本。三联书店 1998 年上半年出版王佩莉译的《文明的进程》，但只是该书的第一卷。以下的介绍将会指出，此书的两卷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读，单读第一卷，或许会使人误认为埃利亚斯是个戈夫曼式的“民俗”分析者。

〔6〕 不久他便停止了这种治疗，因为负责为他咨询的医生过世，而埃利亚斯又把这也看做是自己的过错。

〔7〕 古兹布洛姆在其《前程未卜的社会学》中，将这种知识氛围归之为“当代中心主义”(hodiecentrism)。参见 Goudsblom, *Sociology in the Balance*, Basil Blackwell, 1977。

〔8〕 曾经在该系执教过的成名人物名括吉登斯，柯亨(P. Gohen)，戈德索普(J. Goldthrope)，莫彻利斯(N. Mouzelis)等。

〔9〕 哈贝马斯于次年成为第二届得奖者。

〔10〕 何谓“公正有序”、“组织有素”，显然都是随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而变的因素。在埃利亚斯这里，更重要的是预期和计算，两者互为前提。这是埃利亚斯提出人的日常行为“理性化”、“心理化”和“超脱”之发展等观念的基础。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11〕 康德:“我们由于艺术和科学而有了高度的文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礼貌和仪表方面,我们是文明得甚至于到了过分的地步。但是要认为我们已经是道德化了,则这里面还缺少很多的东西。因为道德这一观念也是属于文化的;但是我们使用这一观念却只限于虚荣与外表仪式方面表现得貌似德行的东西,所以它只不过是成其为文明化而已。”——《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5 页。

〔12〕 在这方面,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和《寻求刺激》等书中都多次提到文化史名家荷兰的赫伊津哈(Huizinga)的《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和《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学院文库》已于 1996—1997 年推出了两书的中译本,可以比照一二。

〔13〕 Elias, N.,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Basil Blackwell, 1985; Aries, P., *Western Attitudes to Death: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14〕 如福柯所言,恰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禁忌使话语凸显,构成了某种反作用,最深刻地体现了权力话语的独特作用机制。参见本书《福柯》一章的讨论。

〔15〕 但人口增长只是复杂的因果决定机制中彼此相纠缠的多种要素之一。只不过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和权力源泉。而劳动分工的程度又非常低下,所以人口的增长才在这一特定时期产生非常巨大的作用。

〔16〕 即 Elias, “Tech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2。此文最初为埃利亚斯于 1986 年 9 月 30 日在汉堡德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讲,后经曼内尔整理翻译。

〔17〕 参见本章第三节的“运动与暴力”一节。

〔18〕 这在他以后关于知识与科学的理论以及投人与超脱的论述中是关键性的线索,参见本章下文。

〔19〕 Elias, “Tech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2, 11.

〔20〕 实际上,真正的“外来人”是甲区的住民,他们才是后来搬迁进来的。有关该小镇各区具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参见 Elias with Scotson,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Frank Cass, 1965。

〔21〕 另外,埃利亚斯 1964 年在海德堡召开的韦伯百年纪念会上宣读了论文《群体卡理斯玛与群体污名》(Group charisma and group disgrace),提出我群形象包括我群卡理斯玛和我群污名,两者(包括他群的对立看法)相辅相成,逐渐会被转化为自我形象。为维持这一形象所须付出的自我约束(比如遵纪守法)可以换来共享荣誉的利益。

〔22〕 可以参看埃利亚斯:《文明史上两性之间权力均衡关系的变迁》(‘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sexes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收于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4[2—3],1987, pp. 287—316)。他在英国时原本写有一本关于自古罗马以来两性之间权力关系变迁的手稿,但在他去德国讲学期间,被女仆误认为废纸丢进了火炉。这或许是埃利亚斯唯一一本永无可能重见天日的作品了。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23〕 参看 Mennell,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the Human Self-image*, Basil Blackwell, 1989, 137—139。此外,有论者在两极之外又加上了第三极(marginal),即不足以对内局群体构成威胁,因而相互权力(不均衡)关系不构成主轴的游离群体。

〔24〕 70 年代以前缺乏其作品的英文译本是一个重大原因。他自己对这种局面也负有一定责任,曾三番五次拒绝出版《文明的进程》英文本的建议。此时他已开始根据以往未曾利用的笔记修改原书,添写关于手淫的内容。

〔25〕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摇滚及流行现场音乐会、恐怖片、侦探故事、人工攀岩、游乐场……

〔26〕 Elias with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Basil Blackwell, 1986, 115.

〔27〕 Elias, *Mozart: Portrait of a Genius*, Polity, 1993, pp. 7—8.

〔28〕 同上书,p. 14.

〔29〕 《德国人》不仅在理论脉络上与《莫扎特》多有交契,而且实际上也就莫扎特的个案本身作有简短阐述。

〔30〕 参看 Mennell,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 1991, 175.

〔31〕 该文中译文见《国外社会学》1997 年第 4—5 期合刊,应星译。

〔32〕 参见 Mennell,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 1991, 159;关于待出版的文集《人的形象》的情况参见后记;其中有关的英文文献包括:"Problems of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6, Vol. 7(3):226—252;"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Perspectives", 1970, *Sociology*, Vol. 5(2): 149—168 and (3): 355—370; Elias 1982; "What is the role of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utopias for the future?", in *Limits to the Future*, Wassenaar, NIAS: 60—80; Elias,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Basil Blackwell, 1987.(尤其是其中的"The fisherman in the maelstrom"一文)。

〔33〕 埃利亚斯在"The fisherman in the maelstrom"一文中生动地譬示了这一点。

〔34〕 Elias,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s", in Elias, R. Whitley and H. Martin (eds.)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s and Hierarchies,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Reidel, 1982, 37.

〔35〕 参见《文明的进程》1968 年德文版序,收于 Elias, *Reflections on a Life*, Polity, 1994。

〔36〕 波勒纳(Pollner)在 1987 年写的《世俗理性》(*Mundane Reason: Reality in Everyday and Sociological Discourse*)中指出,社会学和所谓"常识"共同拥有一个基本预设,即存在一个独立于认知者的外在世界,有能力的感知者可以把握到它。但这种预设只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生现象,或者说是文化上的或然现象,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下才能实现。

〔37〕 转引自 Mennell,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 1991, pp. 200—201.

〔38〕 比如在像斯金纳《科学与人类行为》、洛伦兹《论侵犯》、威尔逊《社会生物学》这样的一些著作里,人类的社会行为都被归之为某种生物习性甚至基因特征。

〔39〕 参见 Elias, *The Symbol Theory*, Sage, 1991, 53.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40〕 可以参看 Elias, "O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motions: a process-sociological essa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4.

〔41〕 甚至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以车代步的现代人步行能力的退化。

〔42〕 参见 Elias, *Reflections on a Life*, Polity, 1994.

〔43〕 参看 Eil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Basil Blackwell, 1991.

〔44〕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85.

〔45〕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Pantheon Books, 1969, 210.

〔46〕 参见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Pantheon Books, 1969, 221.

〔47〕 埃利亚斯早在《文明的进程》中就以妇女的泳衣演变为例,说明了这种"开放"背后所需的对人对己更大的约束。再有如论体育运动与暴力时概括出的高度控制的去控制化情感宣泄(参照布迪厄所谈的反抗行为所蕴涵的辩证关系:在个人自主性增长和非正式化增长的背后,是根植更深的自我约束,更明确的权力不平等,也更少自觉的解放意识)。

〔48〕 详细情况及文献参见 Mennell,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 1991, pp. 24—26, 278—286; Peter Gleichmann, "Norbert Elias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收于 TCS, Vol. 6 (1989), pp. 59—76; Mike Featherstone, "Norbert Elias and figurational sociology: some prefatory remarks", *TCS*, Vol. 4 (1987), pp. 197—211.

〔49〕 参见 Goudsblom, *Sociology in the Balance*, Basil Blackwell, 1977; Goudsblom, Jones and Mennell, *Human History and Social Process*,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89; Kranendonk, Willem, *Society as process: A Bibliography of Figurational Soci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Publikatiereeks Sociologisch Instituut, 1990.

〔50〕 参见 Roger Chartier, 'Social figuration and habitus: reading Elias',收于氏著 *Culture History*, Polity 1988。1987 年埃利亚斯九十寿辰时,包括布迪厄在内的众多学者到场祝贺。

〔51〕 发表在英美社会学主流杂志上的书评以及许多学者对埃利亚斯学说的参引绝大部分只涉及《文明的进程》乃至只是第一卷。

参 考 文 献

(1) 埃利亚斯的著述

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94, 一卷合订本(1939 年初版)

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Blackwell, 1978;中译本《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Basil Blackwell, 1982.

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Power and Civility*, Pantheon Books, 1982.

Elias, N., *The Court Society*, Pantheon Books, 1983 (1969 年初版).

Elias, N., *What is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 1978 (1970 年初版).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

Elias, N.,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s", in Elias, R. Whitley and H. Martin (eds.)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s and Hierarchies*,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Reidel, 1982, 3—70.

Elias, N., "The retreat of sociologists into the present",收入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4 (2—3).

Elias, N.,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Basil Blackwell, 1985.

Elias, N.,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sexes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收入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4(2—3).

Elias, N.,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Basil Blackwell, 1987.

Elias, N., "O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motions: a process-sociological essay", 收入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4(2—3).

Elias, N., *The Symbol Theory*, Sage, 1991.

Elias, N.,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Basil Blackwell, 1991.

Elias, N., *Time: An Essay*, Basil Blackwell, 1992.

Elias, N., *Mozart: Portrait of a Genius*, Polity, 1993.

Elias, N., *Reflections on a Life*, Polity, 1994.

Elias, N., *The Germans: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bitu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ias, N., "Tech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收入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2, 7—42.

Elias, N.,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Basil Blackwell, 1986.

Elias, N., and John Scotson,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Frank Cass, 1965.

(2) 二手文献

Gleichmann, P., Goudsblom and H. Korte (eds.) *Human Figurations: Essays for Norbert Elias*, Amsterdams Sociologisch Tijdschrift, 1977.

Goudsblom, J., *Sociology in the Balance*, Basil Blackwell, 1977.

Kilminister, R., "Structuration theory as a world-view", 收入 C. A. Bryant and D. Jary (eds.) *Giddens'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Routledge, 1991.

Kuzmics, H., "Embarrassment and civilization: on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work of Goffman and Elias", 收入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8, 1991, pp. 1—30.

Mennell, S.,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the Human Self-image*, Basil Blackwell, 1989, 1991 增订版改为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4(2—3).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2, pp. 43—143.

van Krieken, 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oul: Elias and Foucault on discipline and the self,"收于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Vol. 31(2), 1990.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KU
1922